



再寄道心与明月

中国古代人物作品考论

滕新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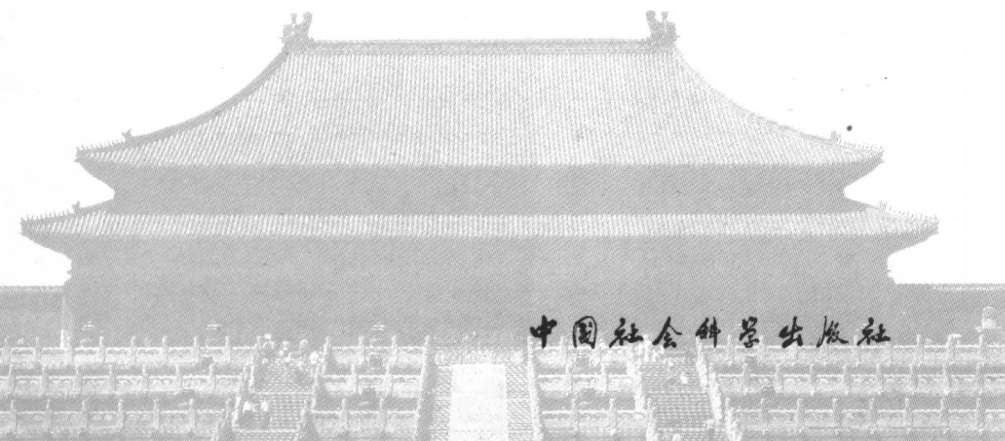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再寄道心与明月

中国古代人物作品考论

滕新才/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寄道心与明月/滕新才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04-5920-3

I. 再… II. 滕… III. 历史人物-评传-中国-古代 IV. 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544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九章文化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滕新才，男，1965年生，重庆荣昌人。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代表作有《明朝中后期饮食文化探赜》、《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探析》、《明朝中后期居室文化初探》、《明朝中后期旅游文化论》、《明朝中后期狎妓之风与文学创作》等，出版《管子白话今译》、《唐玄宗小传》、《康熙帝》、《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论》、《中国伦理范畴丛书·仁》等著作。

本书是作者继《且寄道心与明月——明代人物风俗考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文史研究专著。稿分三辑，前两辑重新审视历史文化名人左丘明、项羽、刘邦、赵飞燕、黄巢、宋徽宗、李东阳、吴三桂等，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客观评价他们在中国社会发展关键时刻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后一辑旨在梳耙中国文化重要典籍和相关史事，涉及《管子》思想、杜诗名物、诗文作品及地方摩崖石刻等文献研究，视角独特，苦心孤诣，一得之见亦属见微知著、沙里淘金。

目 录

左丘明姓氏名字考辨	(1)
论陈胜项羽刘邦的小农意识效应	(8)
宋义史事稽沉	(23)
赵飞燕：从历史真实到文学虚构	(29)
杨玄感起兵与隋末农民战争	(43)
论黄巢的性格特征及其影响	(50)
宋徽宗评议	(65)
郑和下西洋的是是非非	(77)
李东阳与茶陵派	(82)
李自成与崇祯帝和议再探	(122)
吴三桂反清性质新探	(130)
吴三桂与清代西部大开发	(143)
石达开不救天京管窥	(155)
良弼铁良交恶与清末政局	(166)
《管子》思想论纲	(176)
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之“乌鬼”考	(188)
《天城石壁记》的文献价值	(196)
《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寻绎	(216)

君臣同赋平蜀颂

——从朱元璋、刘基文看明夏战争 (224)

《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文化解读 (240)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9)

左丘明姓氏名字考辨

关于左丘明的姓氏名字，两千多年来出现了多种说法，遂难定论。第一种说法是：姓左，名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因此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总结说：“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

第二种说法是：姓左丘，名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段话与《报任少卿书》“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同出一辙。在这里，司马迁既然以“左丘”连文，则“左丘”二字姓，“明”其名也。清代学者朱彝尊《经义考》就是这样认定的：“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应劭《风俗通》：‘丘姓，鲁左丘明之后。’然则左丘为复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为作传，《春秋》止获麟，《传》乃详书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为弟子者自当讳师之名，此第称《左氏传》，而不书左丘也。”朱氏赞同西晋杜预所说左丘明系孔子弟子的观点，认为左丘明是

因避孔丘之讳，故将其书命名为《左氏传》。

第三种说法是：姓丘，名明，“左”是史官职称。上引应劭《风俗通》曰：“丘姓，鲁左丘明之后。”因此清代学者俞正燮在其《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中断言：“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丘明传《春秋》，而曰《左氏传》者，以为左史官言之。”

平心而论，先贤们的三种说法都难以成立。首先，据郑樵《通志·氏族略》著录的古代各种姓氏的渊源，有“以族为氏”的左，“以官职为氏”的史、左史、左人、左尹，而绝无以“左丘”为氏者，诸复姓中亦无“左丘”其氏，可见第二种说法缺乏历史依据。司马迁以左丘连文，纯粹是为了行文上的对仗，不能据此推断为复姓。其次，如果说《左传》是因作者为左史官而言之，则其书当名曰“左史传”之类，而不应称为《左氏传》，第三种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只有第一种说法稍能自圆，却又明显地违背了古人的称谓习俗。笔者试以中国古代礼制为切入角度，论证《左传》的作者姓左（左氏），名不详，字丘明。

按先秦时代，古人不仅有姓有氏而且有名有字，战国以后姓氏合而为一，但名外有字的习俗则一直保存了下来。《路史》曰：“伏羲氏正姓氏。”然则中国姓氏的产生，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最初，姓是代表一个婚姻单位的。在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里，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同一母亲的后代结成为一个部落，内部禁止通婚，否则“其生不蕃”。为了区别不同的婚姻集团，姓便应运而生，作为同一血缘关系的标志。故《说文解字》释曰：“姓，人所生也。古之圣神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而氏则是姓的派生，代表一个氏族。也就是说，氏是家族的象征。《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

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左”议定为丘明的姓氏才是真正的“义最古无疑”。

由于古人有名有字，如何称呼便须有相应的礼节。一般说来，若系自称、谦称、卑称、上对下和长对少称呼，则称名；若系尊称、下对上、幼对长和平辈称呼，则称字。如《论语》中孔子都自称“丘”，对学生基本上是称名，学生在老师面前则互相称字。这个传统影响非常深远，直到近代，“直呼其名”还被视为极其失礼的行为，相反，称字则是对其人大大的尊敬。孔子称左丘明就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左丘明的生平，史书记载极少。西汉时严彭祖著《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室，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汉书·艺文志》载：“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法，假日月而定仪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由此可知，左丘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曾一起观书于周室，然后一个写《春秋》经，一个著《左氏传》。从孔子有关言论来看，他对左丘明非常尊重。《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巧言、佞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认为卑躬屈膝巴结别人和面善心恶的行为是很可耻的，并且先说左丘明认为可耻，然后再以自己的观点去比附，对左丘明推崇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显而易见，左丘明不仅不可能如杜预所说是孔子的学生，而且生活的时代或许比孔子更早，至少年龄比孔子略长，又很有德行，所以孔子才那么尊敬他。

众所周知，孔子一生都是非常强调“礼”的。《礼记·哀公

问》记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周礼，孔子回答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孔子认为一个人应当努力地“克己复礼”，才算得实现了人格的净化。《论语·颜渊》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孔子而言，非礼的话是绝对不能说的，试想，他在一帮学生面前谈到肃然起敬的鲁君子左丘明时，怎么可能直呼其名呢？

更重要的是，孔子不仅在口头上提倡“礼”，在实际行动上也主张必须符合“礼”的规范。《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结，勇而不中礼谓之逆。’”从他对左丘明尊崇敬重的语气来推论，孔子在学生面前只能是称左丘明之字而不会直呼其名。这一点以后为严彭祖、司马迁、刘歆、班固等人所因袭，遂失其本名。

再者，古人取名是有一定原则的。《礼记·曲礼上》：“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左传》桓公六年有更详细的补充：“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古人在给子女取名时，不得以国为名，以官为名，以日月为名，以山川为名，以隐疾、畜牲、器币为名，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条准则。左丘明是鲁国史官，而鲁国有山名尼丘，如果说“丘明”是他的名，那就明显违背了“不以山川”的原则。在大力提倡“礼治”的中国古代，这种公然的违制简直是

不可想象的。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丘明”是左氏之字，而绝非其名。

既然命名“不以山川”，那么叔梁纥为什么给孔子取名为“丘”呢？作为鲁国的陬邑大夫，叔梁纥迫切希望子孙光大门楣，但遗憾的是他与原配施氏连生九女而无男，与妾生子孟皮，又是跛足，不能嗣位；晚年乃娶颜氏女征在，曾祷于尼丘山，野合而生孔子。孔子出生时头上圩顶，即中间低四周高，恰似尼丘山，因而“以类命”，名丘字仲尼。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特地解释说：“然则臣民之名不以山川，而孔子鲁人，尼丘鲁山，得以丘为名者，盖以其有象，故特以类命，非常例也。”既然非常例，终不成左丘明亦有类似的经历，也依样画葫芦“以类命”？这种几率实在太小了，可以作为“丘明”非左氏之名的一个佐证。

以姓字连称，在中古、近古蔚为时尚，以至于有的人“以字行”而本名反被人淡忘者。那么上古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呢？回答是肯定的，检阅上古典籍，姓字连称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如孔门高足颜回字子渊，闵损字子骞，冉耕字伯牛，《论语·先进》有言：“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

又如，春秋时秦国名将西术字乞，白丙字乙，《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作“西乞”、“白乙”；齐国大将杞殖字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作“杞梁”；齐国大臣高屹字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作“高崎”；工匠之祖师公输般字若，《礼记·檀弓下》作“公输若”；战国时理财专家白丹字圭，《孟子·告子下》作“白圭”；魏国贤者田无择字子方，《庄子》有《田子方》篇；齐国稷下学者田广字骈，《庄子·天下》篇作“田骈”。

再如，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字黄羊，《吕氏春秋·去私篇》记载了“祁奚荐仇”的著名掌故：“晋平公（当为晋悼公，下

同)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从上面的例证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皆有姓字连称的风俗,尤其是孔子,对于他所推崇的人总是姓字并称的,他称呼左丘明当与称呼颜渊、祁黄羊等人属于同一种情况。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既然说“丘明”是左氏之字,那么他的后代为什么却姓丘呢?如前所述,“诸侯以字为氏”,具体说就是“以王父字为氏”。如孔子是宋襄公之后,传到公孙嘉时恰好五代,“小宗五世则迁”,必须另立一家。公孙嘉字孔父,所以这支宗族便以孔为氏。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曰:“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由孔父嘉再传六世即孔子。左丘明的后裔也与此相同,正因为左氏字丘明,他的后代才能以丘为氏;如果“丘明”是他的名,其后裔根本就不可能姓丘了。应劭《风俗通》的记载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丘明”是左氏之字而绝非其名。

至于左丘明其名,可以从他“字丘明”这条线索作一些推测。一般说来,字是名的含义的诠释,或者是名的内涵的发挥。《颜氏家训·风操》有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也说:“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诂言也。《白虎通》曰:‘闻名即知其字,见字则知其名。’盖名之与字,义相比附。”王氏还总结了古人取字的五种规则:“一曰同训,予

字子我、常字子恒之属是也；二曰对文，没字子明、偃字子犯之属是也；三曰连类，括字子容、侧字子反之属是也；四曰指实，丹字子革、启字子闾之属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车、鱣字子鱼之属是也。”比较看来，左丘明的名字可能是第二种情况，即“对文”之属。试举一例说明：乐溷字子明，俞樾《春秋名字解诂补义》：“按《说文》水部：溷，乱也，一曰水浊儿，是溷有浊义，《楚辞·离骚》曰‘世溷浊而不分兮’，《涉江篇》曰‘世溷浊而莫余知兮’，皆其证也。……《淮南·原道篇》曰：‘清目而不以视。’高注曰：‘清，明也。’溷浊与清明义正相对，乐溷字子明，犹晋阎没字明，盖取相反者为义。”左丘明的名字，大概与此相去不远。

论陈胜项羽刘邦的小农意识效应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社会，造就了持续达数千年之久的小农文化。这种文化类型的主体——小农阶级，所追求的理想从来是风调雨顺、物我一体、男耕女织、家给人足的生活模式。以此为基本内涵的小农思想，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狭隘、保守、自私、虚荣诸般名色了。虽然它也曾支撑过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热爱故土，改造自然，与命运抗争，但它对中华全民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的演进，对革命运动的飞跃发展无疑起着束缚、禁锢与阻碍的作用。小农意识的这种消极影响在秦末大起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 陈胜的权欲

小农阶级是一个以从事分散的小规模个体农耕经济为标志的社会集团，他们人数众多但社会实力并不雄厚，由于政治上没有特权，经济上缺乏实力，所以社会生活中的小农阶级往往企羨权势，仰慕富贵，攀比威仪。这种对金钱和权力的片面追求，往往诱使他们的思维和言行误入歧途。秦末大起义的首脑人物陈胜，如果拂去人为罩在他头上的圣光，便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权势与富贵的热衷者，《史记》的一段记载把他的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通“傭”）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①

身为“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却并不甘于贫贱，这无疑陈胜比他同时代人高明之处。但是他的所谓“鸿鹄大志”，却暴露出一种赤裸裸的对金钱权势（即所谓“富贵”）的企求，这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有损这位农民领袖的高大形象。

对金钱富贵的企羨往往是与对权力势要的追求同行并举的。陈胜起义时曾说过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②诚然，这句话包含着对封建等级制的抗议和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但这种抗争却是以“举大名”为前提而标榜虚荣的，其终极目的则在于推翻现有等级阶梯、打倒现行王侯将相而自为之，并建立新的等级秩序。方其初起时，陈胜还是比较自卑的，他深知仅凭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难孚众望，不足以树立权威、号令四方，所以“诈称公子扶苏、项燕”，拉大旗作虎皮，《史记》称此举乃是“从民欲也”。仔细分析之下，不难看出，这不过是陈胜借扶苏“其贤”和项燕之仁来抬高自己身价的权宜之计，一旦条件许可，他就必然自践王祚，南面称孤。

攻占陈城后，在当地三老、豪杰的怂恿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这是令许多论者所津津乐道的“革命创举”。其实，称王立号是陈胜权力意识的必然归宿，在他内心深

①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

② 同上。

处积淀着强烈的权欲。大泽起义后，农民军接连攻克蕲、铎、鄢、苦、柘、谯、陈诸地，一时震响，陈胜自以为时机成熟，万乘独尊的绝对权威诱使他草率地登上了王位，此举失误极大。在当时，起义军的势力仅仅限于苏、皖一带，虽然攻下了一些城池，却并没有消灭秦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动摇秦王朝的统治基础，直到后来刘邦入关时张良还一再慎重其事提醒他“秦兵尚众，距险”，警告他不得掉以轻心。而陈胜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称王立号，不啻是自树靶子，惹火烧身，把大量的秦兵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所以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刑徒、人奴产子，拼凑武装，首先扑向的目标便是“张楚”起义军，先败周文，次败田臧，再破伍徐，兵临陈城，陈胜败死。反秦事业暴兴暴衰，瞬息烟云，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陈胜过早称王，自取其咎。

就当时形势而论，并不是非得称王立号不可。秦朝以武力征服天下，立国又行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积怨至深。传至秦二世，更是“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速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嗷然若焦热，倾然若惨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饾”^①，已至众叛亲离之绝境。陈胜也深知“天下苦秦久矣”，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天下自会“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崤山以东）豪俊并起而亡秦族矣”^②，秦朝的灭亡势成定局，“无愚智皆知之”。事实上，在陈胜称王以前，已有刘邦聚众“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③；张良行刺秦始皇失败后游侠各地，“聚少年百余人”^④；

①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④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